

中国国家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局 编



文明
的

曙光

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国家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局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7
ISBN 7-5004-5103-2

I. 良... II. 中... III. 良渚文化—文物—图录
IV. K871.1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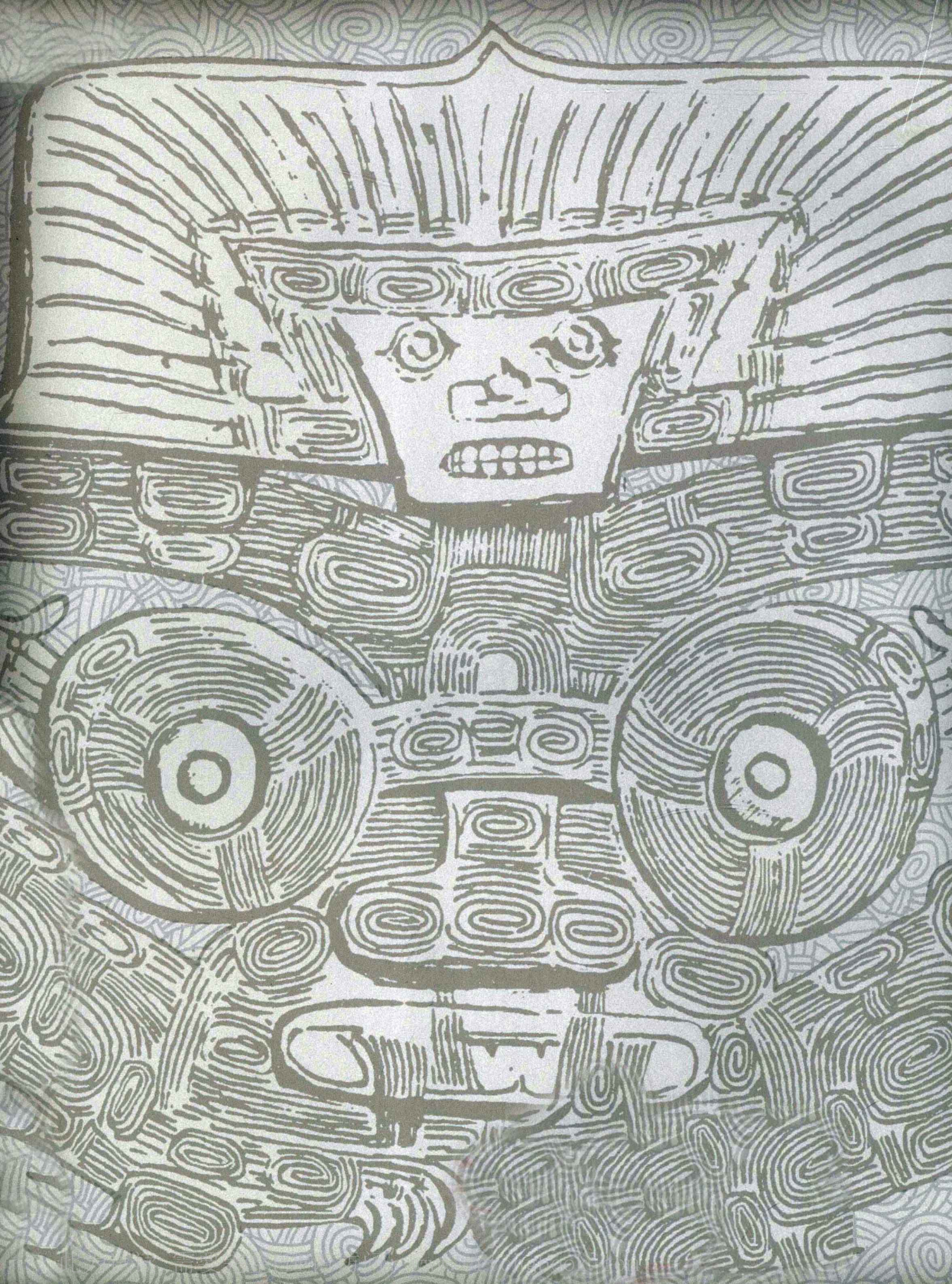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497 号

文明的曙光

——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

编 辑 中国国家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局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22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 7-5004-5103-2
定 价 320.00 元





中国国家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局 编辑

文明的曙光

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

展览主办：

中国国家博物馆 浙江省文物局

参展单位：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省余杭博物馆

浙江省良渚文化博物馆

浙江省平湖市博物馆

浙江省桐乡市博物馆

浙江省海盐县博物馆

展览后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国家文物局

展览策划：朱凤瀚 董琦

展览总监理：郭萍

展览项目负责：杨桂梅

展览设计：杨桂梅 张运 刘志强 闫子瑛

图册编辑委员会：

潘震宙 单霁翔 朱凤瀚 鲍贤伦 董琦 陈官忠

曹锦炎 陈浩 徐新民 郭萍 杨桂梅

学术顾问：牟永抗 王明达

文字撰稿：刘斌 方向明 芮国耀 赵晔 蒋卫东 丁品 陆文宝 罗晓群

程杰 杨根文 周伟民 李林 何秋雨 王屹峰 杨桂梅 张运

编辑：杨桂梅 张运 徐新民

责任编辑：冯广裕

英文翻译：杨桂梅 张运

线图描绘：蒋名未 赵晔 王屹峰

地图编绘：张洁

摄影：严钟义 李永嘉

装帧设计：严钟义工作室



陈雪松
中国国家博物馆 馆长

致辞

人们常说，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久居京华，也未尝不是如此。我在江苏生活了五十余年，故乡秀丽的山水和丰厚的文化遗存早已深深地镌刻于心。“不思量，自难忘”，有时与故乡类似的些许事情甚至都会触动我的乡思情怀。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局联合举办的《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就这样拨动了我的心弦。

良渚文化系因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得名，因此很多人会误以为良渚文化只是分布在浙江地区。其实，江苏吴县的张陵山和草鞋山、武进的寺墩、昆山的少卿山以及上海等地的遗存也颇为重要，为研究良渚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本次展出的良渚文化文物精品二百余件，其中精美的玉器向人们展示了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两大制玉中心之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文物虽来自浙江，但与江苏地区的良渚文化属于同一类俦，令我深有似曾相识之感，激动莫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全面实施前为数不多的重要展览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不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日益兴旺的展览工作的辉煌谢幕，而是展览工作将要进入另一重要阶段的精彩开篇。我谨向为此精彩开篇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浙江省各参展单位，向为本展览和图录编辑工作付出极大辛劳的项目组所有成员致以深切的谢忱！

阮贤伦
浙江省文物局
局长

致辞

乙酉年夏，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浙江省文物局联合举办的《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面世，这是扬良渚文化之精义，为学林和世人瞩目的幸事。

在已经逝去的20世纪，中国考古学经历了一个累积发展的过程。几代考古学人胼手胝足的努力，使我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从中原中心论逐渐转变为文化多元论，从社会单线进化发展为各个文化区系演变与相互碰撞。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的建立过程中，有关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共生的，我们有理由认为长江下游也是中华文明的策源地之一，而位于浙江余杭、德清的良渚遗址群则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文化作为我国环太湖地区一支距今5300—4000多年，以农业为主的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人工营建的大型建筑基址、人工堆筑的祭台、相当普遍的玉器随葬及人祭制度、大量的礼仪用玉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玉雕，种种现象表明了良渚时期社会已存在着明显而悬殊的等级与职能差异，氏族制已濒临解体。尽管由于某种原因，这支考古学文化衰落了，但它对同时期诸文化及后世的夏商周文化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可谓流风远被，余韵袅长。

此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主要集中了浙江省多年来良渚文化田野考古工作所收获的丰富资料，其间也体现了专家学者具体入微的研究成果。200余件展品反映了良渚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信仰意识、丧葬习俗等方方面面，其中又以良渚文化中最显耀的一种文化类型器——温润、质细的精美玉器最为炫目。

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济先生就曾说过：“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从这个角度而言，希望这个展览，能为我们了解中华文明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为我们认识自我、开拓精神视野，为中国文化的革故鼎新作出贡献！

最后，向中国国家博物馆为这个展览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虔致感谢之忱！祝展览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国家博物馆
副馆长
董继

前言

六十多年前，浙江省杭州湾的一个小镇——良渚，引起世人瞩目。一个曾经灿烂辉煌千年的远古文化，一个对华夏文明形成史有着巨大影响的远古文化，一个湮没数千年而无任何历史记载的远古文化，由中国考古学家的双手发掘出来了，这就是当今享誉中外的良渚文化。经过六十多年几代学者的不断探索与研究，可以肯定地说：良渚文化的发现足以改写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历史记载。诚如良渚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所言：良渚文化的发现，“对于中国文化贡献甚大”。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曾有幸到良渚一带参观学习。站在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遗址上，眺望周围百余处良渚文化遗址，不由地感受到，距今5000—4000年期间，中国东南地区依稀闪烁着文明的曙光。良渚遗址群形成不同大小等级“金字塔式”的结构。既有中心遗址发现的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也有一般遗址发现的小型半地穴式居址；既有中心遗址发现的人工堆筑土方量达9万立方米的高台墓地，也有一般遗址发现的无正式墓坑无随葬品的小墓。所有发现的遗迹遗物表明，良渚文化是夏商周三代以前中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顶峰。

在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1936年—2006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浙江省文物局合作举办《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使我们有机会回眸和凝视这一辉煌的远古文化。展览的第一部分为“石器”，第二部分

为“陶器和织物”，恰恰让后人想起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与试掘，当时获得的是黑衣陶与石器。展品中的三角形石犁、长条形石镰、穿孔石斧、各式石刀等，都是良渚文化常见的农业生产工具。高度发达的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原始经济，奠定了良渚文化繁荣昌盛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展品中精美的刻纹双鼻壶、陶澄滤器、带盖豆、实足陶盂、陶屋模型、绢片、麻布片等，反映出良渚文化工艺水平高超的制陶业与丝麻纺织业。良渚文化出土了大宗的玉器，被誉为中国史前的玉文化中心之一。展品的第三部分为“玉器”，即重点展示了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展品中既有贯通天地的法器“玉琮”，又有神秘莫测的礼玉“三叉形器”、“冠状器”；既有象征军事权力的礼器“玉钺”，又有象征等级权力的礼器“玉璧”。展品中还有形式各异、名目繁多的玉饰件，如玉璜、玉玦、玉管、半圆形饰、串饰、玉镯、玉带钩等，可谓精美绝伦，令人目不暇给。总之，200余件展品充分展示了良渚文化的文物精华。

感谢浙江的考古同仁们！本次展览的所有展品，是他们考古发掘工作的辛勤成果。也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同仁们，他们为筹备本展览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我相信，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型展览之一的《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将把近五千年前东海之滨的这一辉煌的远古文化展示在观众面前。

目 录

5	致辞	潘震宙
6	致辞	鲍贤伦
7	前言	董琦
12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严文明
17	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刘斌
25	良渚玉器的种类及其纹饰	向方明
33	良渚文化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34—63 石器

36	石钺
37	石钺
38	石钺
39	石钺
40	石钺
41	石钺
42	石钺
43	石钺
44	石钺
45	石钺
46	石钺
47	石钺
48	石钺
49	石镰
50	石犁
52	菱形石刀
53	单孔石刀
54	双孔石刀
55	三孔石刀
56	双孔石刀
57	双肩石刀

石刀	58
石刀	59
石刀	60
有段石铤	61
有段石铤	62
石铤	63

陶器和织物 64—123

双鼻陶壶	66
带盖双鼻陶壶	67
刻纹双鼻陶壶残件	68
陶澄滤器	70
黑陶刻符椭圆形豆	72
黑陶豆	74
刻划纹陶豆	75
带盖陶豆	76
多鸟头刻纹陶豆盘残件	78
黑陶杯	79
黑陶带流宽把杯	82
宽把陶杯	84
刻纹折腹陶罐	88
鱼鳍足陶鼎	92
陶鼎	94
陶鼎	95
陶鼎	96
陶鼎	97
陶鼎	98
黑陶鼎	99
带盖陶簋	100
实足陶盂	102

106	黑陶盆
107	陶屋模型残件
110	鹰头形陶器盖
112	刻符陶圈足
114	刻符陶片
116	刻符陶牌
117	刻符陶片
118	刻符陶片
120	陶网坠
122	陶纺轮
122	绢片
123	丝带
123	麻布片(复制品)

124—337 玉 器

126	玉琮
128	玉琮
129	玉琮
130	玉琮
132	玉琮
134	玉琮
136	玉琮
138	玉琮
140	玉琮
142	玉琮
144	玉琮
145	玉琮
146	玉琮
147	玉琮
150	玉琮

玉琮	152
玉琮	158
双联玉琮	161
玉琮	162
圆形玉琮	166
玉琮	170
玉璧	172
玉璧	173
玉璧	174
玉璧	175
玉璧	176
玉璧	177
玉璧	178
玉璧	179
玉璧	180
玉璧	181
玉璧	182
玉璧	183
玉璧	184
玉璧	185
刻纹玉璧	186
玉璧	190
玉璧	191
玉璧	192
玉璧	193
玉璧	194
玉钺	195
玉钺	196
玉钺	197

198	玉钺
199	玉钺
200	玉钺
201	玉钺
202	玉钺 (一套)
204	玉钺 (一套)
205	玉权杖组件
209	玉璜
210	玉璜
211	玉半圆形饰
215	玉半圆形饰
218	玉三叉形器
220	玉三叉形器
222	玉三叉形器
226	玉三叉形器
227	玉三叉形器 (连管)
228	玉三叉形器 (连管)
229	玉三叉形器 (连管)
230	玉管
232	玉管
233	玉管
234	玉管
235	玉管
236	琮式玉管
237	琮式玉管
238	琮式玉管
239	琮式玉管
240	琮式玉管
241	琮式玉管

琮式玉管	242
鼓形玉珠	242
玉串饰	243
刻花玉串饰	244
玉串饰	246
玉串饰	247
玉串饰	248
玉串饰	249
玉串饰	250
玉串饰	251
玉坠	252
玉镯	253
玉镯	254
玉镯	255
玉镯	256
玉镯	258
玉镯	259
玉镯	260
玉镯 (一对)	262
玉镯	264
分体玉镯	266
玉冠状器	267
玉冠状器	268
玉冠状器	270
玉冠状器	272
玉冠状器	274
玉柱形器	276
玉柱形器	277
玉柱形器	278

279	玉柱形器
280	玉柱形器
281	玉柱形器
282	玉柱形器
283	玉柱形器
286	玉柱形器
288	玉柱形器
289	玉圆牌
290	玉块
291	玉圆牌
292	玉圆牌
294	玉圆牌
296	玉圆牌
297	玉三角形牌饰
298	玉牌饰
299	玉锥形器
300	玉锥形器
301	玉锥形器
302	玉锥形器
304	玉锥形器
305	玉锥形器
306	玉锥形器
307	玉带钩
308	玉带钩
309	玉柄形器
310	玉柄形器
312	玉匕形器
314	玉勺
316	玉端饰

玉端饰	317
玉端饰	318
玉端饰	318
玉端饰	319
玉端饰	320
玉端饰	321
玉端饰	322
玉端饰	323
玉端饰	324
玉纺织工具组件	325
玉端饰	326
玉鸟	328
玉鸟	328
玉鸟	329
玉鸟	330
玉鱼	331
玉龟	332
玉蝉	334
玉芯	335
良渚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大事记	336
英文索引	340
后记	351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严文明

从良渚遗址的发现和被初步认识,至今已将近七十年了,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而被正式命名也已四十六年。在这么长的时期中,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可说是一浪接着一浪,不断有新的突破。不但对良渚遗址本身的研究已经大大深入,而且发现和发掘了一大批像寺墩、草鞋山、福泉山、庄桥坟等重要的遗址,获得了十分丰富的珍贵资料。在当前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众多著作中,良渚文化已成为首先被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博物馆推出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向观众展示四五千年以前长江下游先民的伟大成就和走向文明的特殊道路,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知道,良渚文化主要是分布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体部分大致可分为太湖以南、以东和以北三个较大的群落。太湖以南的群落以良渚遗址群为中心,还包括杭州地区的老和山、水田畈、辉山、横山,嘉兴地区的荷叶地、雀幕桥、庄桥坟、新地里、普安桥、千金角以及宁绍平原的慈湖、名山后和浦江的阔塘山背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东群落的中心不甚明确,以上海福泉山比较突出,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和昆山赵陵山三地相邻,年代互有先后,似乎也是一个中心。其他还有苏州地区的东渚、俞家墩、绰墩、少卿山和上海地区的马桥、松江广富林和金山亭林等一大批遗址。太湖以北的遗址发现较少,可能与考古工作不够有关。不过江阴高城墩和武进寺墩都有规格甚高的贵族墓地,当是本区前后相继的中心遗址,其他遗址有常州和无锡地区的城海墩、罗墩、嘉陵荡、仙蠡墩等,镇江磨盘墩和地处太湖西北的江宁胥庙也有良渚文化的遗存。此外在太湖以西的溧阳洋渚也是一个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它南面的小梅岭可能是良渚文化玉料的主要产地之一。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主体部分基本上是环绕太湖而发展的,只是因为西面多山,遗址甚少。但良渚文化并不局限于太湖周围,它还不断地向外扩张,主体部分之外的边缘地区可达江苏北部、浙江南部和安徽东部;至于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所及,则北达山东,西至江西,南到福建和广东。甚至对山西的陶寺类型和陕北的神木石峁一类遗存也有一定的影响。

良渚文化是以快轮制造的黑陶和雕工精细的玉器而著称的。陶器的种类主要有鼎、豆、簋、圈足盘、双鼻壶、宽把带流杯和小口高领瓮,还有少量的大口缸、鱼篓形壶和捏流觚等。在良渚遗址群中还常见长椭圆形的盛鱼盘和带漏斗形过滤器的圈足碗等。圈足器特别发达是 its 特点。器物表面多打磨光滑,显得素洁高雅。只有在一些特别讲究的陶器上才有朱绘或针刻的花纹,其母题有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这些陶器的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优美,在同时代或稍晚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山东龙山文化可以媲美。

良渚文化的玉器特别发达。仅良渚遗址群中的反山墓地就出土了1100余件组。如果按单件计算则多达3200余件。其中有用作仪仗的斧钺,有用于宗教法事的琮、璧等,有用于装饰的璜、玦、项饰、佩饰、手镯等,有餐具匕、勺等,有纺织具、纺轮等,有穿着上用的带钩、纽扣和穿缀于衣服上的各种动物形饰品如鸟、龟、鱼、蛙、蝉等。有在漆木器上镶嵌用的各种形状的玉块、玉片和玉珠,还有许多不知用途也难以正确命名的玉器,如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圆形和三角形牌饰以及各种形状的端饰等等,种类繁多。其加工更是十分精细。现代加工玉器的基本方法,如线割、锯切、管钻和抛光等,当时均已采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某些高档玉器上还应用了先进的砣具。管钻的直径小的只有1—2毫米,大的可达4—5厘米,长度可达20厘米以上,而且两头对钻,如果没有稳固的钻架是无法操作的。许多玉器上都有美丽的花纹。例如在一件号称琮王的玉琮上就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一件柱形器上更雕刻了12个神人兽面纹,只不过其中的6个稍有简化。有的钺、三叉形器、璜和半圆形牌饰上也雕刻有相同的图形。神人头戴羽冠,身披皮甲,并带一兽面护胸,显得十分威严神圣。整个画面只有3厘米高,却刻得非常细致复杂。有时在1毫米宽度内就有四五道刻纹,看过的人无不叹为观止。人们注意到这种图形仅仅出现在良渚文化中心最高等级墓葬中的高档玉器上,而次一等级的贵族墓中则以各种不同的简化形式出现,其覆盖面遍及整个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成为联系整个文化的精神支柱。

良渚文化的漆器也有很高水平。从某些大墓中

发现的漆盘、漆壶和漆杯来看，都是黑地朱绘，并且镶嵌了许多玉饰，显得十分珍贵。

良渚文化的木工和建筑水平也是很高的，它继承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发展。斧、锛、凿等木工工具比以前制作得更加精良。房屋的梁柱多加工成大型方木，例如在莫角山旁的马金口便发现有40厘米见方、长数米的木构件，在庙前发现的两座大型房基，其柱洞也都是方形的。用大型方木而不用圆木，可见其房屋建筑比较讲究。许多地方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水井，其中有不少木构井圈。有的是用木板拼成圆筒形，有的是拼成井字形，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木工的水平。至于生活用具中的木器，因保存不好只有零星发现，有椭圆形鱼盘和簋等。

历来传说黄帝的妻子嫫祖发明了养蚕缫丝，是否属实无从稽考。现在知道，至少在良渚文化时期便已经有丝织物了。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就发现有丝带和绢片。后者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各达47根，已经是很细的丝织物了。须知钱山漾并不是一个很高规格的遗址，只不过因为保存条件好而发现了一大批有机物，其中包括丝织品。可以设想在最高等级的墓葬中，如果保存条件好的话，会发现多么精彩的丝绸织物啊！

江浙地区的稻作农业历来是比较发达的。良渚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中国最早实现了犁耕。许多遗址都已发现了石犁，还有破土器、“耘田器”、石镰和石刀等成套的农具。对于石犁是不是真的可以作犁来使用，或者说是不是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犁耕农业，人们是有过怀疑的。因为文献记载商周时期还是用耒耜而没有犁。有人根据甲骨文说有“犁”字，但是没有实物的证据。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名耜，有人据此推测春秋时期有了牛耕，牛耕当然是用犁的。北方发现最早的犁是战国时期的铁犁，准确些说是铁犁头即铧，所以战国已经有犁耕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前些年在江西新赣大洋洲发现了两件商代的青铜犁，看来南方的水田确实可以比北方更早用犁耕。良渚文化的石犁既然很像后来的犁铧，当然也可能真是作犁来用的。过去牟永抗和宋兆麟曾经对石犁的用法进行过复原的尝试，最近在平湖庄桥坟发现了安装在木质犁底上的石犁，将有助于这种农具的科学复原。犁耕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因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所以在农业发展史上，总是把犁耕农业的出现看成是高于锄耕农业的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良渚文化首先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给社会提供了较多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

才能使手工业获得全面的发展，诸如玉器、漆器、丝绸乃至陶器的制造等方面，都超出了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这就使得良渚文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比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更为彻底。由于大部分手工业的高级产品几乎都为贵族所掌握，使得良渚文化的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甚至分裂，这正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良渚文化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一般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不过近年来从过去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遗存中分离出了一个所谓广富林遗存，其年代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因此良渚文化结束的年代应适当提前，也许在公元前2500年比较合适。

良渚文化的早期是继承马家浜文化的崧泽期（也有称崧泽文化的）而发展起来的，因而还保留某些崧泽期的特点，同时又有显著的质的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贵族坟山和高规格祭坛的出现。例如上海福泉山、江苏的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常州罗墩等都是在良渚文化早期堆筑起来的人工坟山。有的是在人工土台子上建房埋葬，例如浙江的桐乡普安桥便是这种情况。这些坟山上埋葬的多是较大的有玉器随葬的墓，也就是贵族的墓葬。当然也有一些较小的墓，但比起平地掩埋的墓葬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社会分化在埋葬制度上的反映。

早期的祭坛有良渚遗址群中的瑶山和汇观山。因为瑶山上有几座早期的墓葬（墓1、墓4和墓5等）打破了祭坛，祭坛的起建年代当不晚于早期墓葬。汇观山出过早期玉器，也有可能是早期起建的。还有卢村的高台则可能是在早期人工建筑的祭坛。前两个祭坛都建在小山顶上，顶面分别用不同土色筑成回字形的图案，四边斜坡修成几级台阶并用石头护坡。到良渚文化中期这两个祭坛都成为贵族的墓地，可见当时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完全是由贵族把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崧泽期主要分布于太湖的东部和北部，东南只到嘉兴地区，杭州地区极为少见，良渚遗址群所在的良渚——瓶窑一带基本不见。可是一到良渚文化早期，这里便建立起高规格的祭坛，也出现了一些等级较低的聚落如庙前和吴家埠等遗址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居民显然是从外地迁来的。这好像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它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个拥有很大支配权的权力中心。这一行动应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因为这里是浙西山地与浙东平原的交接地带，两边的资源都可以很方便地加以利用。从地形上看，这里被西天目山两支余脉南北夹持，形成一个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

约34平方公里的小盆地，东苕溪从中间穿过，既便于防守，又利于交通，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之处。这种情况到良渚文化中期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

进入良渚文化中期，良渚—瓶窑一带形成了一个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巨大的遗址群和以荀山为中心的规模稍小、规格也较低的遗址亚群，我们统称为良渚遗址群。至今在这里发现的遗址已多达120多处，其中许多地点因限于初步调查而无法准确分期，但从已发现的一些情况来看，似乎主要是属于良渚文化中期的。

莫角山平面为长方形，东西约670米，南北约45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它的整体高出周围地面数米，像个长方形的土台子，上面又还有三个较小的台子。在小台子的前面曾发现过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和数以万计的经火烧过的土坯。这些火烧土坯又被推到大土台的边缘并加以层层夯实以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巨型的建筑当为宫殿或类似礼制性建筑之所在，而整个莫角山可能即是一座台形的城址。这台形城址的始建年代尚不清楚，但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是已经存在了。城里面的遗迹也还没有经过全面而仔细的勘察，因而更为具体的布局和功能也还难以推定。不过那里有超过其他任何遗址的大规模高等级建筑，近旁的反山又有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因而把它看成是整个良渚遗址群乃至整个良渚文化的最高权力中心，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前面已经谈到，良渚遗址群所代表的人群本来就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有组织地从各地移民而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先的基于血缘的社群组织，是重新组织的复合体。在这个复合体中有莫角山那样的政治权力中心，有姚家墩和马金口等处贵族宅第，也有若干平民居址。有塘山等那样的制玉作坊和荀山附近制造高档陶器的作坊，甚至还有水运码头的设施。有贵族专用的祭坛、坟山，也有普通平民的墓地。尽管大多数遗址点的具体内涵尚不得而知，仅从已知的一些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按社会等级和职能划分而不是按血缘组织划分的大聚落群，有远超过一般聚落的人口规模，很像是初级形态的城市。说明良渚文化已经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变，从而迈开了向文明社会演进的决定性步伐。

良渚遗址群同各地的联系和控制，可以从贵族阶层的埋葬制度和高等级玉器的雷同等方面进行观察。例如早期的常熟罗墩、吴县张陵山、昆山赵陵山和上海福泉山等墓地都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头向基本上都朝南。罗墩出土的龙首纹圆牌饰与良渚

遗址群的瑶山和反山所出十分相似。张陵山的镯式琮和作为梳背的所谓冠状饰与瑶山同类器基本相同。中期的江阴高城墩、昆山少卿山、海宁荷叶地等处的琮、璧、钺组合及其用料与制法也跟良渚遗址群相同或相似。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更是与瑶山、反山的简化形态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一些高档玉器可能是统一生产和分配的，而掌控权自然是操之于良渚遗址群的权力中心。

到良渚文化晚期，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是否还是整个文化的中心，抑或文化中心有所转移？是否像有些学者说的向北迁移了？应该说直到目前的考古发现还难以清楚地作出回答，只能从一些相关的线索进行分析和思考。早在1919年，美国人弗利尔从上海购买到一批据传出自浙江的玉器，现存弗利尔博物馆。其中有几件玉璧上有用极细的针刻的图画，画面是一只鸟站立在阶梯形台子上（试与瑶山和汇观山祭坛作比较），或站在台上竖立的柱子上。大家都认为这是良渚文化晚期最高级别的玉器，只是具体出土地点不明。很幸运前几年在安溪百亩山也出土了一件形体和质地都很相象的玉璧，而且也有针刻的阶梯形台子。因此弗利尔博物馆的玉璧很有可能也出自良渚遗址群。

事实上，在良渚遗址群出土玉璧或传说出过玉璧的地点至少有20多处，其中有不少可以明确知道是属于晚期的，如文家山、钵衣山、钟家村、桑树头、庙前等处都是。由于绝大部分地点并未进行发掘，很难说其中没有几个最高规格的祭坛或墓地。甚至莫角山台城也可能一直使用到晚期，至少现在还没有到晚期就停止使用的证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良渚遗址群近旁的横山发掘过两座晚期的高等级墓葬，墓中出土了琮、璧、钺等代表最高等级的玉器组合。墓2更出土了132件石钺，数目之多是良渚文化中所仅见的。墓主人也许是一位掌握武器生产和保管的头领。这说明良渚遗址群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部分地控制着最高水平的玉器和武器的生产和分配，证明良渚遗址群的权力中心的地位直到晚期也没有完全改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良渚文化晚期毕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次级中心遗址的扩大和独立性的加强，这从福泉山和寺墩两个遗址的情况可以得到说明。

福泉山位于上海青浦区重固镇，为一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的长方形土台，在良渚文化早期就在崧泽期的遗址上堆筑起一个土台并埋设墓葬。到良渚文化晚期土台增高，墓地面积极扩大，墓葬的规格也显著提高，一般有彩绘的木质葬具。随